

北美汉学中国诗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措用

徐宝锋

提 要 结构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常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自然被北美汉学家们在进行中国诗学思想研究时所措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以高友工、宇文所安和倪豪士为代表的一批北美的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研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引述和借鉴的痕迹。北美汉学家们对于结构主义方法的措用与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实证性研究结合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及对旧的结论的突破。

关键词 北美汉学 中国诗学 结构主义

DOI:10.15990/j.cnki.cn11-3306/g2.2015.03.037

The Structuralism Method Used by North American Sinologis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ics

Xu Baofeng

Abstract: Structur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analyzing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It is naturally used by the North American Sinologist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Chinese poetic thoughts. From the 70's to the early 90's, Sinologists like Yu-Kung Kao, Stephen Owen and William Nienhauser cited structuralist theories and used structuralist methods in their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which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erspective and angle of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long run. Combining structuralist method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ir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s, those north American Sinologists thus produced an awareness of the breakthroughs of the old conclusion from new proble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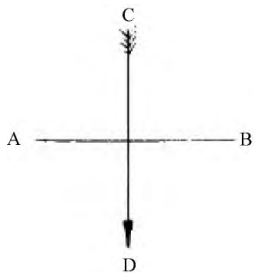
Key words: Sinology in North America; Chinese poetry; Structuralism

北美不同时期的汉学家们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方面可谓各异其趣,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也颇多新意。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因为汉学家们对于中国文学与文论问题的观照不存在本土学者积重难返的身份焦虑意识,或隔层借鉴的理论“套版反应”,从而能比较自如地将对西学方法的汲用与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实证性研究结合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及对旧的结论的突破。也正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会暗含或明显透露出一些比较的尺度与对比较方法的使用,甚至是在实证性较为突出的研究里,也多能从中透现出方

法与理论使用的痕迹,及在汉学视域下展开的自我文化指涉。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用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主要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自然被北美汉学家们进行中国诗学思想研究时所措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高友工(Yu-Kung Kao)、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为代表的一批北美的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研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引述和借鉴的痕迹。

—

高友工是目前美国汉学界最具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不仅延续了陈世骧(Chen Shih-Shiang)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建立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路径,而且超越了陈世骧相对细碎、散漫的字源考证以及文本批评的学术方法,建构出了一个更具体系性和理论化的中国抒情传统架构。在这一框架的构建过程中,高友工从经验架构和材料原则两个角度对中国诗歌的抒情性结构作出了结构主义的剖析。



高友工认为中国抒情美典的经验架构表现为“抒情自我”和“抒情现时”这两个坐标的定位。这一时空坐标架构的表达灵感显然受到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文学研究中推广的共时态、历时态之说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有着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如图所示“同时轴线(AB)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连续轴线(CD),在这条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的一切事物及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①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最终形成了横的静态平面与纵的动态平面两个研究平面。在这两个研究平面上,“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从共时的角度讲,“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问题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②;从历时的角度讲,“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替代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③高友工根据索绪尔的这种划分,确立了“时空定轴”和“同一关系”。不同于索绪尔的纯粹基于语言逻辑结构的划分,高友工在设定其“时空定轴”时从审美经验的角度出发设定了“自我”(self)和“现时”(present)两个观测点,并从抒情的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认为“时空定轴”上存在着一种主观的时空,在主观时空定轴上的“自我”和“现时”两个定点是经验世界的生长点,最终借助语言质料“外现”(externalize)于客观的时空轴上。这样一来,就可以逐渐生成一种主客综合的“同一关系”,实现自我此刻与现象世界的感应,达成外向的“分析语言”与内向的“象征语言”的完全相通,最终实现一种“综合”的心理过程,使抒情真正实现。高友工认为,在这一综合的过程中,“‘分析语言’是外向的,追求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绝对的真理,那么‘象征语言’

①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9页。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43页。

是内向的,只求一个内在的、主观的、相对的印象世界。这个由外向、功利的目的转向内向、自足的目的就决定了下层的知的结构”^①。

雅各布森认为话语是依循选择与组合两个基本结构模式进行的。“选择轴建基于等值原则、相似与相异、同义与反义;而组合轴,即延续的建立,则建基于相邻原则。诗歌功能把等值原则从选择轴投向组合轴。”^②雅各布森关于诗歌功能的这一“等值原则”被高友工借用为了其构建中国抒情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他在谈及中国抒情美学的经验材料与解释时认为“所谓‘释义’功用其实即代表一种‘等值’关系,在这里是指出‘语料’中与‘语典’中的相等成分:词的符号与它的‘内涵’(connotation)及同义词。这在‘语料’本身中出现则为‘比喻关系’、‘相等关系’、‘文内解释’。但‘语料’之外的解释过程则是不可须臾离此的,否则‘语言’则不能了解。因此在‘艺术’的解释中,‘欣赏者’也必须能控制、运用它有关的‘典式’,在文学中自然包括了‘语典’。耶氏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运用在语言的‘选词择字’(selection)过程的‘等值’性转而施之于‘连词成句’(combination)的过程则是‘诗’的语言的最大功用。我在此文要说明这种‘等值’原则在文学及艺术结构中的重要性。可是我却不能同意耶氏以此为诗的基本原则。因为‘等值’性固然重要,但它只是解释过程的一个层次而已。”^③高友工将“比喻的等值性”(metaphorical equivalence)和“代喻的延续性”(metonymical continuity)这两个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成功地应用到了其对于中国诗歌中的抒情意象的理解上。他认为“比喻的等值性”和“代喻的延续性”就是“等值原则”应用于选择轴和组合轴而造成的诗学效果。“由此‘隐喻性’我们才能推到‘转喻性’,也是从‘并立’的‘等值’进入‘延续’的‘等值’。”^④“雅各布森以‘转喻性’来形容此种‘延续’,自然是意识到了这种‘延续’已与‘等值同一’合一了。”^⑤高友工认为,“等值同一”实际上是对其所设置的“时空定轴”的一种回溯,是以表达情感和象征的意义为终极旨归的。因为在时空轴的坐标中,“在‘时间间架’中‘延续’(continuity)、“断绝”(discontinuity)之外,有的是‘时序’(temporal sequence)的前后,而在‘空间间架’中‘邻接’(continuity)、“隔离”之外,有的是‘方位’(directionality)”^⑥。“同一”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与“延续”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是一切结构原则的根本,其他原则都是它们的推衍和扩充。

除了时空定轴以及等值原则,高友工还将经验划分为了“感性的”、“结构的”和“境界的”三个层次,由这三个层次出发,高友工将抒情美典的价值依次区分为:感性的快感、形式结构的完美感、境界的悟感。形式结构层次是高友工利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关键所在,也是高氏抒情美学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环节。高友工认为,第一层次所涉及的感性的快感是片断性、非独立的,“因为不能被清晰分辨的物象很难形成深刻的心象,而各自为政的心象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结构。前者无法再经验界的感象层次予人快感,后者则进而涉及结构层次

①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页。

② Roman Jak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David Lodge and Nigel Wood(ed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0, p. 38.

③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41页。

④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66页。

⑤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6页。

⑥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68页。

的内在价值了。”^①这种片段的、不能被独立看待的感性的快感,只有当艺术品结构的独立性在内在经验中体现,才能成就一个自主而且有本身价值的美感经验。“因此结构上的对称、统一、张势、冲突种种特征也许是互相矛盾的条件,而其为结构之独立则是一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高友工认为“感官层次进入结构层次,也正是由快感转入美感的关键”^②。高友工认为在诗歌语词所表达的基本形象和最终生成的诗歌境界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s),这些“中介结构”是拥有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过渡性的“感象”,文本的诠释活动是需要依靠这些“中介结构”最终的得以实现的,但却不应以“中介结构”之“感象”作为诠释的终点,因为就“中介感象”而言“‘等值’原则所形成的是一种‘构形’(pattern)或‘节奏’(rhythm),是以‘形相构式’(formal design)来体现‘通性’;‘延续’原则所组成的是一种‘表解’(diagram)或‘模式’(model),是以‘模仿间架’(imitative structure)来代表‘关系’”。^③“中介结构”是以抒情的诗歌境界之最终达成为旨归的。高友工认为,在以保存自我现时的美感经验的为目的的抒情美典的“抒情自我”与“抒情现时”的坐标定位中,内在经验架构和外在媒介形式呈现出共时历时(隐喻与转喻、等值与延续)的交错展开时,个人就能够对此结构感受到一种统一而完整的美感经验,最终得以使抒情美典在形式结构层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高友工比较成功地将上述结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到了其唐诗研究之中,其《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一文专门讨论了唐诗中的时间与空间、典故的结构以及作为组织原则的对等等问题,并充分注意到了雅各布森的等值(对等)原则在唐代近体诗中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效果以及对于抒情审美的心理影响。

总的说来,高友工借用了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等来自西方的理论,成功地将“等值”等结构主义的组织原则转接到中国的抒情经验之上,而这些理论的运用,对其唐诗的意象和意境的研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

二

倪豪士熟练而自信地运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明确地将唐代的传奇文学看作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的证明和补充。在《〈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一文中,倪豪士选择了《文苑英华》中所有的三十三“传”,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他从结构主义的叙事模式理论出发,通过对“传”本身所具有的文本结构模式的描述,较好地对其感兴趣的传奇文本加以了解读,取得了较好的理论效果。

倪豪士首先指出,理想的“传”由五种“文类的基码”(generic code)组成,这五种编码分别为:1、叙述方式(narration) 2、文学模式(mode) 3、文体(style) 4、结构(structure) 5、涵义(meaning)。这五种“文类的基码”组成了“传”的基本叙事模型,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传奇文本模式之中。倪豪士根据“传”的五种文类编码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传的理论类型,并对三十三个传以图表的形式予以了结构说明。“第一类是规范性的,由研究者兼叙述者所述,属高模拟形式,具隐喻式文体,为传记事件式(biographical-episodic)的结构,结束于半再现式,半阐述式涵意。第二类由目击者兼叙述者所述,属低模拟形式,也是隐

①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96页。

②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98页。

③ [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60页。

喻式文体,结构上围绕一独白或陈述构成,并发展出一阐述式涵意。第三类由报导者转述,属高模拟形式,使用隐喻式文体及单一事件(single incident)结构,其目标在于一再现性的涵意。”^①因为结构主义文论更加注重文学研究的整体概念,所以倪豪士在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进行“传”的基本理论类型分析过程中,把不同的传奇作品看成了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且力求发现不同的传奇作品在构成“传奇”这一体裁样式过程中各个本质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尤其突出强调了不同的传奇文本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注重标明“传”这种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系统和外在于叙事文学系统的文化系统对于理解某一具体作品的作用。具体到分析策略上,体现在倪豪士从作品本身中所概括出的三种叙事者的型态:1、研究者(a researcher) 2、目击者(a witness) 3、报导者(a reporter)。这三种叙事者的型态最终被倪豪士确定为两类基本类型“经由语意上的相似(similarity)而发展进行的隐喻式文体(metaphoric)和基于毗邻性(contiguity)而发展进行的换喻式(metonymic)。”倪豪士认为这两类基本类型最终影响的是传奇的“文学模式”(literary mode)。“传”的“文学模式”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四种:高模拟(High Mimetic)、历史(History)、低模拟(Low Mimetic)和讽刺(Irony)。

在研究传的具体结构构成单位(structural units)时,倪豪士注重从结构主义角度追寻具体传奇文本的深层结构,以期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刻含义。在对于传奇文学作品之“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关系把握的过程中,他采取了欧尔伯西施特(Peter Olbricht)所列的九种基本组件为范本:1、姓名 2、祖籍 3、祖先 4、教育 5、言行(在长度和内容上有所不同——可能包括仕宦、官阶、轶事和文学等) 6、致仕 7、谥号 8、儿子(后代)的名字并其小传 9、以跋形式出现的作者评论。依据这九种基本范本,倪豪士确立了他所认为的“传”的两种涵意类型:再现型(the representational)和阐述型(the illustrative)。《南柯太守传》是倪豪士眼中唐传奇阐述型涵意类型的代表篇章,他从结构主义出发,采用了日本学者内山知也所划分的《南柯》五个大段和二十七小段为分析段落^②的观点,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南柯太守传》,并且由此引申分析了《南柯太守传》和《异梦录》对于《秦梦记》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能十分明显地感觉到倪豪士对于托多洛夫“叙事句法”理论的应用。

托多洛夫从语言学角度把“叙事句法”的最小单位界定为“命题句”(proposition),命题句构成“序列型片断”(sequence),序列型片断构成本文(text)。倪豪士借助这种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手法提炼出了《南柯太守传》与《秦梦记》两个故事的七个共同事件^③:

1、故事以独身男子入睡始,他梦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2、主人公无缘无故的受到这个国家统治者的宠幸,并娶公主为妻;3、公主才貌双全,夫妻恩爱;4、年轻的公主婚后不久死去;5、然后国王建议主人公返回自己的国度;6、主人公梦醒并把故事告诉他的朋友;7、他们在附近的地方搜索并发现主人公在睡梦中拜访过的,并不完全真实的地方。

倪豪士认为,组成这两个故事的七个共同事件在传奇作品中是依托这七个共同的“命题句”扩展而成的,独立的一个命题句只能组成一个单一的“序列型片断”(sequence),而当所有七个命题句被整体性地组合在一起时,故事也就最终成型了。

① [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页。

② [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第94页。

③ [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第228页。

概括地讲,受结构主义文论影响的倪豪士在研究唐代的传奇作品时并不重视具体文本叙事逻辑的因果解释,而是坚持描绘具体文本的内部结构,注意发现文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同时也并不忽视描述文本跟其他外在文化现象的关系,因为在倪豪士看来,这些外在的文化现象可能会和具体的文本一起构成更大的结构。这一点堪称倪豪士基于结构主义方法立论但却不局限于结构主义方法的高明之处。虽然在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唐代传奇文本加以研究的过程中,倪豪士甚显严谨,给人以十分系统与逻辑性较强的印象。但正是因此也而导致一些失误,他过于自信借助于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的合法性,其公允客观的结构主义论证的背后隐现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气”、“象”、“境界”以及“自然”等传统范畴内涵的盲视。

三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也明显地参照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不过,不同于高友工和倪豪士对于结构主义形式自律的原则强调,宇文所安在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唐代诗歌分析的过程中更加侧重了结构主义诗学在形式批评、隐喻的话语构造功能等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宇文所安对结构主义方法的措用是非常地有限度的,而且主要体现在其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唐诗研究之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宇文所安借用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这对概念来阐述宫廷诗所确立的惯例法则和结构生成关系。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话语活动分成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他认为语言是话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是一种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长期沉积而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则从属于语言本身内部的结构系统,是整个话语活动中与个人意志息息相关的发音、用词、造句的方面。在《宫廷诗的“语法”》一文中,宇文所安宣称“宫廷诗的各种惯例、标准及法则组成了一个狭小的符号系统。这些可违犯的法则后来形成盛唐诗的基本‘语言’。本书自始至终把宫廷诗作为一种‘语言’来处理,试图从它丰富多样的‘言语’——个别的诗篇重建这一系统。阅读诗歌必须懂得它的‘语言’不仅指诗歌与其他口头的、书面的形式共用的广义语言,而且指它的结构语言。”^①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关于宫廷诗的符号系统的说法很明显受到了索绪尔“语言/言语”系统结构理论的影响,无论是其对于宫廷诗、京城诗还是其他唐代律诗创作的理解,还是其对初、盛唐诗每一位诗人作品的描述都是在对于“语言”惯例的沿袭和偏离这一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路下进行的。

其次,宇文所安发现了唐诗在结构上的封闭自足性。系统的封闭自足性是结构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统一整体,对于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理解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将之置放于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宇文所安在对于唐代律诗结构考察的过程中,认为宫廷诗可以归结为三部式整体结构“首先是开头部分,通常用两句诗介绍事件。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由描写对偶句组成。最后部分是诗篇的‘旨意’”^②,读者构造诗篇旨意的可能性只能通过三部式来实现。而这种三部式本身构建起来的恰是一种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整体关系网络。宇文所

①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3页。

②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83—184页。

安认为宫廷诗的三部式整体结构“先于律诗形成,并超越了律诗的范围……成为诗歌变化和发展趋向的标准”^①,并在后来几乎发展为律诗的基本结构。律诗的形成过程就是“普通的八句诗、音调和谐的一定规律及三部式结构逐渐融合的过程。”^②

第三,宇文所安认为在三部式的融合过程所遵循的是“主题阐释结构”和“对偶”两大结构原则^③,并依靠这两大原则封闭诗篇及其各个部分,使诗篇成为一个封闭的统一体,最终结构性地地形成一个自足的系统结构。宇文所安认为“三部式本身就是根据汉语的句式构成:主题加上阐释,二者又一起形成第二阐释的主题。与汉语的句子一样,阐释对主题的逻辑关系通常是隐含的,不是表明的,而且在怎样确定这一关系及这一关系的开放程度上十分自由”^④。在宇文所安眼中,“主题阐释结构”就是三部式的整体构造原则或者说生成机制,而唐诗中的对偶则可以看作为“与主题阐释结构对立的法则”。他认为依照主题阐释结构,唐诗两个对句之间的联系可以是公开而仍然暗示的,但在对偶法则的作用下,两个对句之间却形成了一种既不相互从属又非彼此暗示的复杂关系。虽然如此,宇文所安认为依据结构主义的原则,不管怎样,“主题阐释结构和对偶都倾向于封闭诗篇及其各个部分,使得诗篇成为封闭的统一体,依靠内在的张力获得活力。”^⑤

可以看出,宇文所安虽在其对于诗歌史的梳理过程中借用了结构主义文论的方法论,但并未完全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来展开其话语运作。他对于唐代诗歌的分析中更多地流露出的是一种西方人特有的美学视角,其开阔的诗歌史视野背后所展现出的是一种精巧、犀利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一方面,他规避掉了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在分析以审美性为主要诉求的中国诗歌作品过程中灵动不足的弊病,在分析盛唐律诗时有意识地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宇文所安在技术层面上通过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较好地处理了唐诗中的意象转义和象征问题,从美学的立场突出了唐代诗歌功能之所在,肯定了雅各布森意义上的语境和说话人在分析唐代诗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例举的三位汉学家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代表北美汉学中国诗学研究方法的全部,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存在于20世纪60—80年代的文论研究之中。90年代前后开始,随着西方整个学术的转向,北美地区(也包括英国在内)的汉学研究界也深受其影响,诸如文化研究、各种文化理论、解构主义等对汉学以及其下属的文论研究的渗透,不仅体现在立场、视角等的方面,也体现在方法论的修正与重建上,先前盛行的如形式主义、实证主义、文本主义研究尽管也还继续为学者们所使用,但却在文化研究等新方法的导向上,产生了新的变异。关于这一变化目前由于还处在进行时的状态,因此不易做出的详细的描述,当然我们也期待有新的研究能够对之进行比较全面的发掘,以补充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遗缺。

作者简介:徐宝锋(1974—),男,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汉学、中国文化与诗学。

①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84页。

②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84页。

③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95页。

④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96页。

⑤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324页。